

文革後 600 電影解禁過程

□李 翊

1979年，撥亂反正、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重要標誌，是對「文革」中被禁錮的文化產品的解放。這其中，對大量「文革」前拍攝電影的解禁，成為重新豐富民眾生活的重要決策。

「兩年的時間內，我看了600多部電影。多的時候，一天要看6部。」作為當年電影覆審小組的工作人員之一，現在已經退休的陳少舟說。

那時候，「在審片過程中，起初還有30多部因為各種現在看來很可笑的理由沒有被批准，到1979年覆審小組解散，隨着形勢越來越開放，所有的片子最後都通過了。」

電影覆審五大原則

1976年11月，陳少舟接到通知，到電影局「電影覆審小組」報到。與他一同進入覆審小組的，還有剛從復旦大學畢業的大學生李夢學。當時，中共中央在18號文件中專門提出，為了滿足廣大群眾長期以來看不到電影的狀況，要文化部組成「電影覆審小組」，逐一篩選建國17年來曾被江青打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，只要沒有大的問題，中外電影都可以公開放映。

為此，電影局特意從長春電影製片廠調來武兆堤廠長擔任藝術處處長，負責覆審工作。當時成立的審片組成員還包括從電影學院抽調的史寬、李文彬等人。

陳少舟說：「當時覆審的大原則，毛主席別看香花與毒草的六項政治標準。」另外的原則，李夢學概括為：「首先要看片子裡有沒有涉及到「四人幫」及其餘黨的；其次是有沒有涉及到中央領導人，尤其是那些還沒有被平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者，如果有歌頌他們的必須重新修改或者不能通過。另外，如果有不符合毛

澤東思想的，有損主席形象的也不能通過。

第四條是片子裡的演職人員「文革」中遭迫害還沒有平反的必須暫緩通過，最後一條是，在「文革」前就一直有爭議的，如《武訓傳》、《早春二月》、《北國江南》等影片也不能公映。」

據陳少舟介紹，根據中央18號文件精神，文化電影局首先對「文革」以來的各類影片進行覆審。審查通過的舞台藝術片有：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海港》、《奇襲白虎團》、《白毛女》。通過的故事片有《創業》、《海霞》等23部。

文化生活「餓狠了」

第一批覆審的「文革」前電影有《紅孩子》、《平原游擊隊》、《上甘嶺》。覆審前，各電影廠先初審，選出沒有太大政治問題的影片，然後交由各電影廠所在的省委或者市委宣傳部再審，電影廠與省委都必須給出意見，在報告上寫明影片所有演職員的政治面貌，影片簡介。而影片簡介又包括三部分：影片內容，何時拍的，每個演職員的過往歷史，現在的政治狀況。如果演員所犯的是類似生活作風之類的錯誤，可以在報告中註明，在審查時一旦對影片反映不錯，可在片頭字幕中把有問題的人的名字抹去，而不影響影片通過審查。

工作組成員一般集中看幾部影片，寫一個總的報告交文化部黨組，同意後就劃個圈退回來。然後由工作組成員寫成正式文件，交國務院。中宣部恢復後，改交中宣部。審查通過後，再由工作組寫批件同時發給電影廠與中國電影公司，中國電影公司通知洗印廠印拷貝，根據影片質量考慮是否需要國內外同時發行。拷貝印好後，根據分配比率分發給各個省。

李夢學回憶說：「我記得那批片子裡有《南征北戰》、《烈火中永生》等，看得人熱血沸騰。」在描述那個年代人們文化生活的狀態時，他用了一個詞，「餓狠了！」在覆審過程中，李夢學印象最深、感覺最欣慰的，是影片的公演改變了一批藝術家們的命運，「有的片子，覆審小組認為沒問題，但導演可能受歷史問題牽連一直沒工作。隨着影片的上映，他可能



▲趙丹在《武訓傳》飾演武訓。這部電影是中國最早的禁片

電影《武訓傳》海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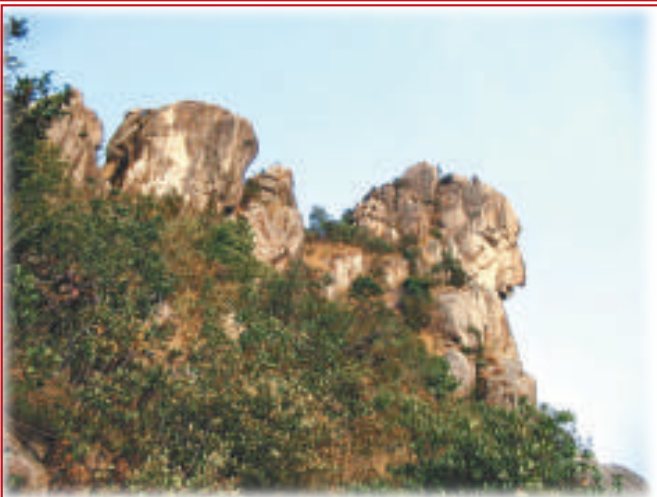


從此恢復了藝術生命。」

由於通過覆審就可以重新印拷貝，影片一上映電影廠就能憑藉拷貝數量從中國電影總公司拿錢，電影廠幾乎以10為單位送審影片，以至於在放映片庫裡，裝着50斤重的片子的大鐵桶堆積如山。

兜兜轉轉回到起點

由於當時忙着大批判，覆審組的工作人員換了一撥又一撥，固定下來的工作人員只有兩人，陳少舟是其中之一。他後來常感慨：「這段時間把別人需要看一輩子的電影都看完了。」他說，在這段審片的過程中，隨着時間推移，對影片的限制越來越少，逢年過節，為配合節日推出一批好片子，工作組經常是集中看兩個星期的片子，多的時候一天6部，然後上報。上面基本不用再看片子就能通過。



虎頭山舊稱虎頭山

香江回眸

虎頭山即獅子山

□余也

香港以虎命名的地名，多不勝數，如屯門有虎地村，粉嶺有虎地排，青衣有虎地角，九龍有老虎岩；海灣有虎地灣、老虎笏，島嶼有虎王洲、老虎吊排，山坑有老虎坑，山坳有白虎坳等，而為居民所熟知的獅子山，在較遠的年代，原來亦以老虎為名，稱為「虎頭山」。

「虎頭山」古書有載

《新安縣誌》云：「虎頭山在官富九龍寨之北，亦名獅子頭，怪石嵯峨，壁立插天，其下凹路，險峻難行，其實當衝要道。乾隆壬子年，土人捐金兩邊砌石，較前稍為平坦。」

官富即今日觀塘（昔日曾稱「官塘」）一帶，九龍寨即今日九龍城寨，虎頭山亦名獅子頭，也即是我們現今所稱的獅子山。所謂險峻難行而當要衝的凹路，想來就是分隔獅子山與煙墩山的九龍坳了。

挖山洞工程浩大

獅子山和煙墩山幾乎是聯接在一起的山脈，正好是九龍市區與新界之間的天然屏障，由九龍乘火車往新界，所經過的最長的一個山洞，就是在煙墩山底下。火車穿洞而出，景色豁然開朗，令人有「別有洞天」的感覺。

煙墩山下的山洞，現今乘電氣化火車只需一兩分鐘便可通過，但百年前興築九廣鐵路時，這段隧道工程卻費了三年時間始能完成，為了洞裡的瘴氣和瘧蚊，不少工人因此犧牲。據說，工程是從南北兩端同時進行的，但隧道挖至中段，竟然無法銜接，後來工程一改再改，這個長四百二十公尺的山洞，才總算貫通。

雲霧掩映驗晴雨

「獅子嶺在六都龍塘側，逶迤里許，有一石屹立崢嶸，雲掛則雨。康熙年間移遷，分界在此，煙墩故址猶存，又名煙墩嶺。」

原來，昔日的獅子山，還是鄉民眼中的「天文台」。所謂「一石屹立崢嶸，雲掛則雨」，就是指獅子山頭的那座著名的獅子石。獅子山雖僅高一千六百餘尺，但山頭時常雲霧掩映，當地人以山頭雲氣的色調驗晴雨，淡白必是晴天，雲色灰黯則要下雨，若是凝然不動帶紅雲，便是有風的預兆，歷驗不爽。

山頂傳說有寶藏

形如獅頭的獅子山頂，全由岩石構成，筆立如削，極難攀登，在此摔死的登山人士，亦不知有多少。據傳說，獅子山頂有寶井，其中藏有一對金蠟燭台，乃無價之寶。不過，傳說歸傳說，「寶井」至今仍無人發現過，更不用說那對「金蠟燭台」了。

（摘自《香港倒後鏡》，坤林出版社）

巧言令色

□王成綱

點解咁講

巧言令色，就是用花言巧語和媚態偽情來迷惑、取悅他人。巧言，乖巧的言辭。令色，美好悅目的容顏。貶義。專指偽善諂媚的容態。

「巧言令色」源自《尚書·皋陶謨》：「禹曰：『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。能哲而惠，何患乎驩兜？何遷乎有苗？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？』」

引文講的是，大禹說：「知人善任才是智者，智者才能任吏妥當；安撫百姓才是仁君，仁君才能讓百姓懷念。明智而仁慈的君主怎麼擔心驩兜作惡呢？怎麼會遷徙流放苗人（有苗，又稱「三苗」，生活在長江中游以南的古代部落）呢？又怎麼會畏懼「巧言令色」的奸佞之臣共工呢？」

驩兜、有苗、鯀、共工在堯舜禹時代並稱四兇。大禹認為絕對仁慈的君主對「四兇」該是無所畏懼的。

《水滸傳·第八十三回》：「寡人已自差人暗行體察，深知備細，爾等尚自巧言令色，對朕豈吾！」

又，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子曰：『巧言令色』，鮮矣仁！」意思是，孔子說，巧言令色的人，很少有仁的。孔子所謂的「仁」，指人的本性。巧言令色的人，表面上極力討人喜歡，實際上包藏禍心，伺機害人，從本質上已經喪失了人性。

（摘自《中國成語典故》，新世界出版社）

翰林妙對解危難

□朱格超

巧聯妙對

清朝乾隆間，廣西武鳴出一位壯族翰林，名劉定迫。博學多聞，能詩善對，頗多傳聞。

據說，劉氏在京期間，有一年春節前，乾隆皇帝寫了一條上聯，懸掛在宮殿大柱上，讓文武百官對。誰能對上，重重有獎；若是無人對上，要取消省親假。乾隆那半聯是：

四口心思，思父思母思妻子
聖上限期已到，仍然無人對出，決定延期三天。文武百官個個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蟥，抓耳撓腮，一籌莫展。眼見延長期快完了，有人急中生智提議：「聽說劉定迫是對對能手，何不找他來對！」於是即刻派人去翰林院找來，劉某內情盡知，已經成竹在胸，很有把握地說：「我能對上，大家放心去省親吧！」於是授筆立就。聯云：

寸身言謝，謝天謝地謝君王
乾隆皇帝拍手叫絕，即傳聖旨

：批准文武百官省親。文武百官無不敬佩，感謝劉氏救了大家。

【小析】乾隆出聯，用四個「口」字（即「田」字）和一個「心」拼成「思」字，接着連講三個「思」字，都有具體內容：父、母、妻、子，春節在即，百官思親，切合時節，情趣盎然；劉氏深知，皇上巧用拆字、重複方法，又含數目字「四」，不大好對，下聯用「寸」、「身」、「言」三個字組成「謝」字，「寸」也表示數量，可與「四」對，以「謝」對「思」，都是動詞；第二小句以三「謝」對三「思」，妙在「君王」既是一個詞，又可分開來說「君」和「王」，恰與「妻子」（古代指「妻」與「子」）相對，異曲同工，妙語如珠，下聯既已對上，又代百官謝了皇上，乾隆樂不可支，喜降聖旨放省親假。竊以為：乾隆不過同眾卿開了個玩笑，劉氏真正為大家解除了煩惱，真有意思，值得玩味。

（摘自《古今巧聯妙對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）



湖南莽山

莽山在湖南郴州市宜章縣南部的五嶺群山中。由於位處南北交界，南北方植被共冶一爐，素有「第二西雙版納」之稱。

據估計，莽山有花植物1500餘種，木本植物102科700餘種，生長着各種古老珍稀樹種，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森林博物館。

□懷舊堂主 圖、文

林語堂曹聚仁標點之爭

□周孝中

名人軼事

在現代中國文壇上，曹聚仁與林語堂都是很著名的，他們之間在學派上的對立、論爭也是人所共知的事，我這裡要講的則是由劉大杰而引起的一場論爭。

標點失誤大做文章

原來曹聚仁是提倡大眾語的，林語堂則主張語錄體，標榜「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」，以明代公安派袁中郎為宗師，並譏諷「大眾語嚕嚕囃囃」。

兩學派的短長且不去評說它，只說20世紀30年代中期，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

一位青年教授劉大杰，教學之餘，勤於著述，平日他與林語堂過從頗密，學術上亦有共同語言。劉大杰當時已從事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的撰寫，同時還標點了《袁中郎全集》，後者先出版了，該書扉頁上的題註是「林語堂先生校訂」。這本袁集問世，引起了曹聚仁的注視，並着意從該書中找出了一些標點失誤之處，大做文章。

曹聚仁在《晨報·副刊》發表了題為《標點三不朽》的文章，抨擊袁集中的標點錯誤；繼而在他自己主編的《潮聲》小報上，刊出一條大字標題：「既有劉大杰，何必袁中郎？！」

據與我談及此事的當年暨大教師任曉宇老學長指出，曹聚仁主持的以烏鴉為標誌的

「聽潮社」及其出版物，所用的語言有時是很尖刻無情的，以致被人稱為「烏鴉文人」。由於曹在報刊上公開指名抨擊，劉感到難堪，林語堂也被激怒，而且在暨大校園裡產生了反響，對劉不能不有所非難，甚至有人提出質詢。

曹聚仁林語堂吵嘴

當時，劉大杰也請教了校內黃公渚等前輩，承認「錯了就錯了嘛，錯了就改嘛」！這態度還是比較謙遜的；另外，對於曹聚仁的小題大做和借題發揮，則表示憤懣。為了澄清是非，劉大杰也延請林語堂在暨大禮堂作了一次演講，題為「做人與做文」。

演講的大意是標點錯了並不重要，做人比做文重要得多，當然也對曹聚仁的為人，罵了一頓。林和曹原本是老朋友，從此也疏遠開了。

這場論爭，本是針對劉大杰的標點問題的，林本在幕後，但林知道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故也站出來了，曹後來也寫了一篇《我和林語堂吵了嘴》的文章，說的就是這

件事。幾年之後，也就是在抗日戰爭剛爆發的時候，曹聚仁著的《文思——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》，由上海書店出版了，其中有一篇題為《何必袁中郎》，還是寫道：「袁中郎

全集木刻本，價錢很貴，坊間有標點本袁集出版，就買了一冊來看看，看了以後，卻很失望。」看來他仍是對劉大杰「不敢恭維」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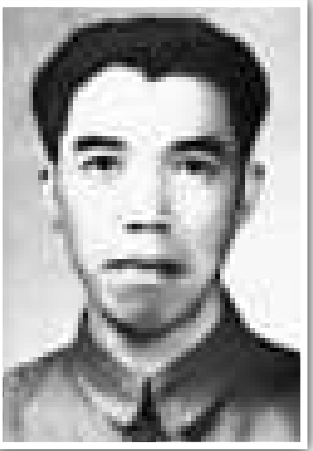
（摘自《暨南逸史》，暨南大學出版社）



主張語錄體的林語堂



提倡大眾語的曹聚仁



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作者劉大杰